

我怎样编写《中国修辞学史稿》

郑子瑜

我撰著《中国修辞学史稿》，观点力求跟得上时代。如《史稿》汉代篇提到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论《春秋》的用辞，赞其能深入地阐明《春秋》遣辞设句的道理，确是一种创举；但也指出董氏在这部书里，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，却是要不得。他尊崇权贵、贱视人民的思想意识是很分明的。

赵光德、吴福林二氏在《开为现代社会科学家作传的先河》（载《晋阳学刊》1985年第4期）所说：“此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：不是先有某一固定的观点，再选择史实为我所用，而是尊重史实，再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，或让准确可靠的史实本身说话，虽不加评论，褒贬自在其中。”二氏的本意，原是对人物的评价问题而发的。但我编写《中国修辞学史稿》确也是根据这个原则而为之的，因为古代并没有完整的修辞理论，每个时代所能找到的修辞理论，其中各家的意见大都只是寥寥数语，而修辞学中的整个项目，各个时代所能找得到的资料，或有此而无彼，或有彼而无此，如果先有某一固定观点，先立下几个项目，再根据史实去找资料，有些资料往往找不到，便缺下来了，无从动笔；由于历史事实所限，由于资料所限，所以我只好尊重史实，根据各时代所能找得到的资料，再就资料加以整理，分成若干类，各立小题目，然后据以编写成书。

我也不用卡片。自从一九六四年我写了《中国修辞学的变迁》以后，十五年间，我阅读时一遇到有关修辞学的史料，便立即复印下来（或抄下来），一张都不遗失，妥为保存。这样，到

了一九七八年东京的大东文化大学为了创办外国语学研究院，聘请我为“中国修辞学研究”这一门的教授的时候，我便开始将如山的一大堆资料，加以整理，先将同时代的集中在一起，分成一大包一大包，再就同门类的修辞理论选出，分门别类，然后动笔编写。先前，当采得资料、加以复印或抄写之后，每立即注明出处，并将自己的意见写在复印纸上（或旁边），现在编写时要引述和评论也就不觉费力了。不过，编写时发现某时代某种资料应该要有，而所搜集的资料中却付阙如，于是再特地去找资料加以补充，也不是没有的事。

有一件事须在此一提的，是我搜集修辞学史的资料，并不都是取自原书，有不少的资料却是转引已别的著作；这些转引的资料，如果容易找到原书，我都再找原书，对照错字，一一加以改正。书稿送到上海教育出版社之后，谢谢出版社的几位文科编辑先生，他们为对照原书，结果发现有些转引的文字，与原书大有出入，有的竟为原书所无，这可能是引述者误写书名。转引的文字与原书有出入，改正便得了。至于原书所无的，那就较麻烦了，到底出自何书呢？如遇所引的资料，很是重要，很有意义，很有价值，放弃未免可惜，我便从可能出现那段引文的同时代（与错写之书的作者同时代）近似的著作中去找；这工作真辛苦，费时也多，有的竟给我找到了，便报告出版社；那些怎么找也找不到的，便只好割爱了，因为来历不明的资料，又怎能加以引述呢？

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专著少之又少，有关修辞的论述，往往夹杂在经解、文论、笔记小说、诗词曲话或其他杂著之中。我须从古籍中去沙里淘金，往往读遍了古代每一名家的文集，才发现有三言两语或一小段的修辞理论。至于诗话中评述诗句，成为修辞理论或属于论辞格的，我想在《史稿》中加以引述或再批评，也先要找到诗话中所引诗句所由出的原书，细读全首，才能评论其得失。如诗话所引诗句，原已详示作者和诗题，便容易找

出全首来；有时只举作者，未提到诗题，也不难找；最难找的，是单举诗句（或诗句中的短语），作者的名字和诗题却一字不提，这真有如海底摸针，到哪里去找呢？遇着这情形，我多数是割爱，但也有不忍割爱的，我便从上下文意，臆测其可能的时代；再就所引诗的风格，臆测其可能的作者，然后再就那作者的诗集中去翻查，有时竟然也会找到，但多数是找不到的。

我在特地去找补充资料的那一段时间，在编写《中国修辞学史稿》的那两三年，还有较早时在早稻田大学与实藤惠秀教授共同编校《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》的那一年，不论星期六下午、星期日或是公共假期，不论气温多冷或多热，日以继夜（我经常在第二天的一时以后才入睡），几乎全无休息地工作，结果两书得以编成和写成。

古人“凿壁偷光”与“引锥自刺其股”，如此这般的苦学，我以为都是不足为训的，因为前者可能导致邻居报警，定罪入狱；后者可能诱发“破伤风”而有致死的危险。我因长时间无法在学术机构工作，而非学术性的工作又极其繁重，使我疲于奔命，偶有机会在学术机构工作，时间又极为短暂，若不抓紧机会，奋不顾身，勤读勤写，就连目下那微不足道的成果也无法达致。照理，我既然长时间无法在学术机构工作，而工作不能与研究相配合，早就应放弃学术研究了，然而我却于心不甘，仍旧死抱住学术不放，可以说是自讨苦吃，愚不可及，结果事不止倍而功尚不及半。我希望世间像我这样不幸遭遇的人的不会再有，从此再没有人迫得非像我这样的悲惨苦斗便无法学成，所以我的舍生苦学也和“凿壁偷光”、“引锥自刺其股”一样，是不足为训的。假如以后还有众多的人须像我这样无休息的苦学才能有小小的成果，则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可悲的世界，希望再没有人会有像我这样的遭遇。

一九八六年七月底写于香港

作者工作单位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